

社会比较与主观地位认同：以广州市为例

刘 晗

提 要：本文从社会比较理论视角出发，运用社会网络与职业经历（JSNET）2009年调查广州数据进行分析，提出了在社会比较过程中人们主观地位认同形成的一般化机制。数据分析结果表明，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随着社会交往对象社会经济地位的升高，人们的主观地位认同会有所上升。这说明，在社会比较的过程中，社会交往对于主观地位认同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一种“群际比较”过程，而非“人际比较”过程。此外本研究还发现，社会交往对于地位认同的影响与个人的社会人口属性有一定的关系。对于自己社会地位关注程度高的人的地位认同更容易受到社会交往对象的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

关键词：社会比较 地位认同 社会交往 人际比较 群际比较

社会不平等现象一直以来都是社会学探讨的核心问题之一，在当前不平等程度加剧的背景下，不平等研究更是成为了全球社会学界的一个重要挑战（Burawoy, 2014）。而近年来，在不平等研究中，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转向对人们主观地位认同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与探讨，开辟了一条传统不平等研究之外的新路径（Lindemann & Saar, 2014）。

主观地位认同是指社会成员根据某项标准对自己的阶层归属做出主观认定，把自己归属于社会分层体系中的某一层（卢福营、张兆曙，2006）。它不仅反映了人们对自己地位和所属社会环境的认知，还会对人们的社会观念、政治行为以及身心健康等方面产生深远的影响（Lindemann & Saar, 2014；华红琴、翁定军，2013）。因而对主观地位认同的探讨不仅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也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与经济快速发展相伴随的是收入分配的持续恶化与社会不平等程度的不断加深（林宗弘、吴晓刚，2010），收入的基尼系数持续上升，至2013年已达0.47（Li, 2014）。相应地，近年来我国群体性事件也在各地不断出现，且呈现参与人数增多的趋势，社会矛盾凸显（Cai, 2008；李路路，2012），严

重影响了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在这一背景下，主观社会地位认同问题也引起了我国学者的关注（相关研究如华红琴、翁定军，2013；吴琼、谢宇，2014；高勇，2013等）。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居民的主观社会地位认同不仅在国际横向比较中相对较低（Li，2014；高勇，2013），且在时间维度上也呈现出“下移”的趋势（高勇，2013）。可以说，对主观地位认同的研究与探讨，对解决我国社会转型期的众多社会问题，维护社会和谐与稳定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主观地位认同的影响因素

在主观地位认同研究中，一个首当其冲的问题就是人们的地位认同是如何形成的。只有对这一问题有了比较全面的把握，我们才能进一步地去分析与解释地位认同是如何影响人们生活的其他方面的。目前，社会学者对于主观地位认同的影响因素的探讨主要集中于社会经济环境的影响和主客观社会经济地位的偏离两个方面。

（一）社会环境因素与主观地位认同

早在20世纪60年代，古德索普（Goldthorpe et al.，1969）等人在探讨工人阶级的资产阶级化问题时就对社会经济环境对工人的阶层意识的影响进行了比较详尽的检验。通过对社会特征（如平均收入、财产安全）、工业化背景（如科技发展、进步的就业政策）以及社区特征（如开放性、异质性）等因素与工人阶层意识的关系进行研究，他们发现在20世纪中叶的英国，收入、工作环境、就业政策等经济条件的改善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工人的阶层认同，但其影响并不像所谓的“资产阶级化”理论所认为的那么明显。

近年来，随着跨国数据收集工作的开展和大型跨国数据资源的公开与共享，对于社会经济环境与社会地位认同的关系的研究呈现出“跨国化”的特征。一些研究者试图通过对来源于不同国家的数据进行分析来探索在全球范围内具有普遍适用性的一般规律。这些研究发现良好的社会经济环境（如经济发展、劳动力市场的优化升级等）有助于提升人们的主观社会地位，而社会不平等状况则会降低社会成员平均的社会地位认同（Andersen & Curtis，2012；Lindemann & Saar，2014）。

以国际比较为基础的研究能够说明处于不同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在某些社会

现象上也存在一定的差异。但我们并不能简单地将基于横向比较的研究发现直接应用于某一特定的社会之中，来解释各种社会现象在一国之内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表现。因此，除了国际比较研究，研究者往往还需对某些社会进行纵贯研究，并通过将横向比较研究与单一社会内部的纵向研究相结合，以实现对于某些社会现象完整的认知。主观地位认同研究也是如此，除了跨国比较研究，对于社会变迁与人们地位认同形成机制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也同样有着重要的意义。就后者而言，1978年以来我国的市场化转型可以说为地位认同研究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案例。我国学者也已经在这方面取得了一些成果。

刘欣（2001）发现在改革的过程中，“丧失传统体制下的既得利益或者未获得充分的改革新利益”均会影响到人们的阶层认知。据此，他提出，阶层意识的产生是动态的，“相对剥夺感”对于人们阶层认知乃至地位认同都有着很重要的影响（刘欣，2002）。该研究对于我国社会转型期人们阶层地位认知的产生机制进行了论述，却并没有明确指出我国居民评价自身社会经济地位的具体指标，更没有探讨不同指标的影响是如何随着改革的深入发展而发生变化的，高勇（2013）的研究则解决了这一问题。通过对2001年和2005年两组数据的分析结果进行比较，高勇发现我国居民地位认同的基础已经由对具体社会单元的归属感转变成了对收入等市场要素的占有。该研究说明了在社会变迁的过程中，人们社会地位认同的参照标准也会相应发生改变，人们评价自身地位的参照指标与社会主流价值观所重视的资源之间存在着一致性。可以说，这一研究发现不仅对于我国地位认同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对于其他国家（尤其是正在或即将经历重要社会变迁的国家）的相关研究也有着一定的借鉴价值。

这些研究，不论是国际比较研究，还是对我国转型期人们地位认同形成机制变迁的探讨，都采用了一种将个体置于宏观的、可变的社会环境中的研究视角。这种研究视角往往暗含着一种假设：在地位认同形成的过程中，人们会通过将自己与其生活的社会经济环境中的一个一般化的他人（generalised other）进行比较，以对自己的社会经济地位进行评价。这也就意味着这一研究视角在探索宏观社会环境对于地位认同的影响机制时，会忽略某些具体的因素（如个人的客观社会经济地位、具体的社会交往对象等）的影响。要解决这个问题，则要从微观层面对主观社会地位的形成与变化机制进行探讨。

（二）主客观社会地位的偏离：“中层认同”现象及解释

谈到主观社会地位的微观影响因素，人们首先想到的往往是客观的社会经济地

位, 各国学者也对此进行了广泛的探讨 (如 Haddon, 2014; Pérez-Ahumada, 2014; 华红琴、翁定军, 2013 等)。但是, 经验研究表明, 客观的社会经济地位并不能很好地解释主观层面的地位认同 (Andersen & Curtis, 2012; 吴琼、谢宇, 2014: 151-156), 在很多国家都出现了“中层认同”的倾向, 在各个社会阶层, 都有很大一部分人认为自己处于社会的中间阶层 (Andersen & Curtis, 2012; Evans & Kelley, 2004; 卢福营、张兆曙, 2006)。

针对这种“中层认同”的现象, 研究者从不同视角出发也提出了不同的解释, 有些解释, 如害怕露富的中庸思想或自我保护思想 (卢福营、张兆曙, 2006), 由于过于依靠某种特殊的社会文化背景, 且难以通过实证研究进行检验, 并未能得到广泛的认可与应用。目前, 就“中层认同”这一问题而言, 取得比较广泛认可的解释是从社会比较的视角出发提出的“同质参照群体” (homogenous reference groups) 理论 (Evans & Kelley, 2004)。该理论认为, 在评价自身社会地位时, 人们并不会对自己所生活的社会进行整体的观察并找到自己在其中所处的位置, 而是从与自己发生直接关联的社会环境 (immediate social milieu) 出发, 对社会进行有偏的观察 (Woelfel & Haller, 1971)。在这种情况下, 即使是地位极高的人, 也会接触到地位更高的人并将自己的社会地位与之进行比较, 从而对自己的地位产生偏低的估计; 而地位极低的人也会将自己与地位更低的人进行比较, 并因而产生偏高的主观地位认同 (Evans & Kelley, 2004)。这样, 就出现了中层认同的现象。

“同质参照群体”理论较好地解释了主客观地位偏离的现象, 并且在微观层面上对地位认同的形成机制进行了探讨, 但该理论主要关注为什么在社会上层和社会下层中会出现地位认同向中层偏移的现象, 并没能给出适用于所有社会阶层的社会比较作用于地位认同的一般机制。本文即尝试从一般化的社会比较过程出发, 探讨社会交往与地位认同之间的关系, 以弥补现有研究在这方面的不足。

二、社会比较与地位认同

(一) 人际比较与群际比较

社会比较理论起源于社会心理学, 由社会心理学家费斯廷格 (Festinger, 1954) 提出, 主要关注在社会群体中社会比较对于人们自我认同与自我评价的影响。该理

论认为人类本性中即有着进行自我认知与自我评价的动机 (Hogg, 2000), 而在缺乏客观的、非社会的标准时, 人们就会通过社会比较来消除自我评价的不确定性 (Festinger, 1954)。就地位认同而言, 虽然每个人都清楚地了解自己的职业、收入等反映自身社会经济地位的因素, 但由于并不存在一个完全脱离于社会的客观指标指导人们根据自己在各要素上的表现来评价自己的社会地位, 因此人们也可能存在着通过社会比较来明确自身社会地位的需要。也就是说, 人们会通过社会比较来调整对于自身社会地位的评价。

要验证上述推论, 最理想的方法是将人们对于自己日常交往对象的社会经济状况的感知和自己的客观社会经济状况进行比较, 并分析两者之间的差距对于被调查者自身地位认同的影响。但是在实证研究中, 我们很难将上述研究逻辑操作化为具体的研究方案, 这是因为人们对于他人的地位的感知往往是基于一些模糊的分类标准 (如大致的行政级别、收入范围乃至单位情况等), 而这种模糊的标准与我们在调查中对于被调查者自身的具体的社会经济指标 (如职业、收入等) 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也就无法直接对两者进行比较并评估两者之间的差异对于人们地位认同的影响。在本文中, 我们采取一种间接的方式测量社会比较与地位认同之间的关系。首先, 我们通过被调查者某些重要交往对象的职业特征来估计其社会交往对象的平均社会地位, 并在控制被调查者自身客观社会经济地位指标的条件下, 分析交往对象的地位对于被调查者主观地位认同的影响。这样, 虽然直接测量的是重要交往对象的社会地位的影响, 但由于对被调查者本身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标进行了控制, 因而也就间接反映了社会比较对于地位认同的影响。因此, 社会比较与地位认同之间的关系可以操作化为下述假设。

假设 1: 在控制客观社会经济地位的条件下, 交往对象的社会经济地位会对人们的主观地位认同产生影响。

假设 1 指出了人们的社会交往状况对于自己的地位认同可能存在着一一定的影响, 但并没有提出这种影响的方向性。因此我们要进一步地分析社会比较作用于自我评价的具体机制。在这方面, 社会比较理论提出了人际比较 (inter-personal social comparisons) 和群际比较 (intergroup comparisons) 两种解释。人际比较就是指个体通过将自己与具体的他人进行比较, 从而减少自我认同的不确定性, 以实现准确的自我评价 (Festinger, 1954)。在主观地位认同形成与调整的过程中, 如果社会比较主要通过“人际比较”而实现, 那么主要与社会地位低于自己的人交往就会产生偏

高的主观地位认同，而主要与社会地位高于自己的人交往则会产生偏低的地位认同。换句话说，在客观社会经济地位指标一定的情况下，交往对象的社会经济地位与个人的主观地位认同呈负相关关系。据此，有假设 1.1。

假设 1.1 (“人际比较”假设)：在控制客观社会经济地位指标的条件下，个体社会交往对象的地位越高，则对于自身地位的评价越低；相反，交往对象的地位越低，则对于自身地位的评价越高。

可以说，“同质参照群体”理论对于“中层认同”现象的解释就是基于上述“人际比较”假设而提出的。但是该假设主要关注以个人为基础的社会比较，而忽略了基于群体身份的社会比较，即“群际比较”(Hogg, 2000)。与“人际比较”相比，群际比较更加强调自我范畴化(self-categorization)在社会比较中的作用，认为在社会比较的过程中，个体会将自己纳入某一群体，并进而通过将本群体与外群体进行比较来调整自我认知与自我评价(Hogg, 2000)。在主观地位认同形成的过程中，社会交往也有可能通过“群际比较”发挥作用。即个体不仅会根据自身的客观条件来评价自己的社会经济地位，还会根据自己社会交往对象的身份与地位来确定自己的群体归属，并据此调整自己的地位认同。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社会交往对象的地位越高，就越有可能将自己归入高社会经济地位的群体，并因而产生较高的主观地位认同。据此，有与假设 1.1 相反的假设 1.2。

假设 1.2 (“群际比较”假设)：在控制客观社会经济地位指标的情况下，个体社会交往对象的地位越高，对于自身地位的评价也会越高；相反，交往对象的地位越低，则对于自身地位的评价也越低。

事实上，这种“群际比较”假设也得到了—些实证研究的支持。例如，边燕杰(2004)在研究社会资本对我国城市居民的影响时就曾发现，我国城市居民所拥有的社会资本情况与其对自己家庭地位的评价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正相关关系。虽然社会资本与社会交往两个概念之间存在着—定的差异，但由于社会资本是以社会交往网络为基础的，因此这一发现也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上述“群际比较”假设。

(二) 社会交往与主观地位认同关系的性别差异与年龄差异

无论是“人际比较”假设还是“群际比较”假设都以人们会将—自己的社会经济地位进行社会比较为前提。事实上，在社会比较的过程中，人们并不会将自己生活

的方方面面都拿来与他人进行比较，而仅仅会在自己关注的，或者对于自己而言比较重要的领域进行社会比较（Festinger, 1954；Hogg, 2000）。因此，由于不同人群对于社会经济地位的关注程度不同，社会比较与主观地位认同之间的关系也可能会受到个人社会人口属性的影响。据此，有假设2。

假设2：社会交往对于主观地位认同的影响与个体对于自己社会经济地位的关注程度呈正相关关系。

对于假设2，本文将着重从性别差异和年龄差异两个方面进行检验。

1. 性别差异

在我国，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观念虽然正逐步向现代的男女平等的理念过渡，但根据2010年“第三期全国妇女地位调查”的结果，目前不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对于传统的性别角色分工观念持认可态度的都占到一半以上（刘爱玉、佟新，2014）。在这种性别观念的影响下，与女性相比，男性对于自己社会经济地位的关注程度很有可能较高。因此，有假设2.1。

假设2.1：社会交往对于男性主观地位认同的影响程度大于对于女性的影响程度。

2. 年龄差异

与性别差异类似，处于不同职业发展阶段的人对于自己社会经济地位的关注程度也可能存在一定的差异。在职业发展的前期，一方面，职业升迁的空间和可能性都比较大，职业职务变动也较为频繁；另一方面，由于处于职业发展的起步阶段，收入和职业地位都相对较低，在生活中也会面临较大的经济压力，因此人们对于自己社会经济地位的关注程度相对较高；而到了职业发展的中后期，由于职业职务相对固定，职业变更或升职的可能性有所降低，且收入和职业地位均有所增长，人们对于社会经济地位的关注也很有可能会转移到其他方面。据此，可以提出假设2.2。

假设2.2：随着年龄的增长，社会交往对于地位认同的影响程度会有所下降。

三、数据、变量与方法

（一）数据来源

本文所用数据来源于社会网络与职业经历问卷调查（JSNET）2009年广州市调

查数据。该调查由西安交通大学实证社会科学研究所以主持，采用多层次抽样的方法，在广州市抽取了43个居委会，共获得1035位有过非农工作经历的居民样本（西安交通大学实证社会科学研究所以，2013）。

（二）变量

1. 因变量：被调查者对于自己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评价

JSNET2009询问了被调查者对于自己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评价，原题为“您的综合社会经济地位在本市大体属于哪个层次？”共六个选项：上层、中上层、中层、中下层、下层和不清楚。由于本题中选择上层的被调查者较少，仅占有所有被调查者的0.2%（参见表1），在本研究中，将上层与中上层合并，然后将中上层或上层、中层、中下层和下层分别编码为4-1，不清楚作为缺失值处理。

表1 2006-2011年不同调查中国城乡居民主观地位认同分布 (单位:%)

| 年份 | 数据来源 | 上 | 中上 | 中 | 中下 | 下 |
|------|------------|-----|-----|------|------|------|
| 2006 | CSS (全国) | 0.4 | 5.5 | 38.5 | 29.4 | 26.1 |
| 2006 | CGSS (全国) | 0.5 | 6.2 | 41.0 | 29.3 | 23.1 |
| 2008 | CSS (全国) | 0.7 | 7.2 | 39.9 | 30.8 | 21.5 |
| 2009 | JSNET (广州) | 0.2 | 5.1 | 42.5 | 30.4 | 21.8 |
| 2011 | CSS (全国) | 0.5 | 7.7 | 43.0 | 30.2 | 18.7 |

资料来源：李培林，张翼，2008；陈光金，2013；JSNET2009年广州数据

在表1中，我们将从JSNET广州数据中得到的主观地位认同分布与2009年前后进行的全国性抽样调查（包括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主持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主持的“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所得结果进行了比较。

与CGSS和CSS相比，本文所用数据的特点主要表现在样本来源方面，CGSS和CSS均为全国抽样调查，样本来源涵盖我国大部分省份的城乡居民，而本文所用数据仅包括了广州市的城市居民。虽然本文所用JSNET数据在样本来源方面有一定的局限性，但从表1可以看出，被调查者主观地位认同的分布情况与其他全国性抽样调查相比并没有过大的差异，虽然地位认同属于上层和中上层的被调查者在广州调查中所占比例较小，但由于这两类本身在各调查中所占比例均较小（合计只有7%左右），因而我们认为这种差异对于总体分布的影响基本可以忽略不计。所以，即使我

们并不能完全排除广州市特殊的社会经济背景（如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等）对于居民主观地位认同的影响，但也可以认为与其他因素的作用相比，这种影响相对较小。

2. 自变量

社会交往对象平均社会地位：JSNET2009 询问了被调查者“在生活中遇到某些问题（例如工作、家庭、感情等方面的问题），需要找人商量”时，首先考虑的五个人及其社会人口属性。我们认为，被调查者在本题中提名的人与被调查者应当有着较为密切的社会交往关系，因而用他们的平均社会地位来代表被调查者社会交往对象的平均水平。理论上而言，由于因变量为被调查者对于自己家庭地位的评价，自变量相应地应为社会交往对象的客观家庭地位，但由于数据中缺乏相关信息，本研究以社会交往对象的平均职业地位情况作为自变量。JSNET 数据中对该题目中提名的五人的职业情况采用了如下的编码方法：首先分为十个类别，每个类别内部按照职称或技术级别分为三个小类。我们按照《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中提出的阶层划分方法（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2002：9）将职业重新划分为四级（由于数据为广州市调查资料，职业信息未涉及农业工作和无业，因而将底层并入中下层），具体编码过程为专业技术人员中的高级职称、中级职称和其他专业分别为社会上层、中上层和中中层；机关单位负责人、事业单位负责人和企业负责人中处级及以上者为社会上层，其余为中上层；办事人员为中中层，商业人员、服务业人员、农林牧渔人员和未分类职业中经营管理人员为中中层，其余为中下层；产业工人为中下层。为了得到被调查者交往对象平均的社会地位情况，我们将社会上层到中下层分别赋分为 4 - 1 分，并以被提名 5 人中非亲属者的地位得分均值作为反映被调查者交往对象社会地位的核心自变量。

性别、年龄：为了检验社会交往对于地位认同的影响的性别差异和年龄差异，我们还需要在模型中加入性别、年龄与交往对象地位特征的交互变量。其中，性别变量为虚拟变量，以女性为参照组。对于年龄，本研究采用了两种测量方式：第一种测量方式将年龄视作连续变量直接加入模型之中，第二种测量则将年龄分为“30 岁以下”、“30 - 39 岁”、“40 - 49”岁和“50 岁及以上”四组，来拟合不同的职业发展阶段，其中“30 岁以下”组为参照组。

3. 控制变量

本文的研究目的是希望通过交往对象的社会经济地位与主观地位认同之间的关系来间接反映社会比较对于人们地位认同的影响，因而需要对客观社会经济地位指标进

行控制。考虑到因变量为对于自己家庭地位的评价，我们也以反映家庭社会经济状况的指标作为控制变量，包括“家庭人均房产价值”（家庭房产总市值/家庭人口数）和“家庭人均年收入”（2008年全年各种收入总和/家庭人口数）两个变量。同时，为了避免共线性问题，不再对个人的社会经济状况（如收入、教育等）进行控制。

此外，考虑到交往对象的年龄结构既与交往对象的社会经济地位和被调查者个人的年龄等核心自变量高度相关，也可能对因变量主观地位认同产生一定的影响，因而在模型中，我们也对交往对象的平均年龄进行了控制。

（三）数据处理与分析方法

鉴于因变量为次序变量，本研究运用序次逻辑斯蒂回归（ordinal logistic regression）方法进行数据分析。

对于缺失值，我们采用多重插补法进行处理，研究所用变量全部纳入预测模型，此外，被调查者及其配偶的一些社会经济指标，如户口、受教育程度等也被纳入预测模型。共创建数据库 30 个。多重插补后的变量描述性统计如表 2 所示。

表 2 变量描述性统计

| 变量名 | 均值 | 比例 | 标准差 |
|-------------|--------|-------|-------|
| 主观家庭地位 | | | |
| 下层 | | 0.218 | 0.013 |
| 中下层 | | 0.304 | 0.015 |
| 中层 | | 0.425 | 0.016 |
| 中上层或上层 | | 0.053 | 0.007 |
| 人均收入 (ln) | 0.478 | | 0.048 |
| 人均房产价值 (ln) | 0.619 | | 0.115 |
| 交往对象平均地位得分 | 2.020 | | 0.048 |
| 交往对象平均年龄 | 38.398 | | 0.500 |
| 年龄 | 39.385 | | 0.416 |
| 年龄分组 | | | |
| 30 岁以下 | | 0.316 | 0.014 |
| 30 - 39 岁 | | 0.239 | 0.013 |
| 40 - 49 岁 | | 0.183 | 0.012 |
| 50 岁及以上 | | 0.262 | 0.014 |
| 性别 | | | |
| 女 | | 0.517 | 0.016 |
| 男 | | 0.483 | 0.016 |

四、数据分析结果

(一) 社会交往对于主观地位认同的影响

表3展示了主观地位认同影响因素的序次逻辑斯蒂回归分析结果。模型1和模型2分别为以连续变量和分组变量测量年龄的数据分析结果。除年龄变量本身外，两个模型中其他参数的估计结果并无明显差异。由模型1可以看出，交往对象平均地位得分的系数为0.252，在0.05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说明社会交往对象的社会经济地位与主观地位认同之间有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符合假设1.2中的“群际比较”模式。也就是说，在其他条件一定的条件下，社会交往对象的地位越高，主观地位认同越高；而社会交往对象的地位越低，主观地位认同也相应越低。

表3 2009年广州市居民主观地位认同影响因素的Ologit分析结果（一）

| | 模型1 | 模型2 |
|-----------------|--------------------------------|----------------------|
| 交往对象平均地位得分 | 0.252* (0.108) | 0.248* (0.108) |
| 家庭人均收入(ln) | 0.307*** (0.057) | 0.298*** (0.057) |
| 人均房产价值(ln) | 0.101*** (0.022) | 0.102*** (0.022) |
| 交往对象平均年龄 | 0.005 (0.018) | 0.005 (0.014) |
| 年龄 | -0.029 [†] (0.016) | |
| 年龄分组(30岁以下为参照组) | | |
| 30-39岁 | | -0.113 (0.195) |
| 40-49岁 | | -0.723* (0.296) |
| 50岁及以上 | | -0.985* (0.418) |
| 男性 | -0.464*** (0.130) | -0.468*** (0.130) |

续表

| | 模型 1 | 模型 2 |
|-------|-----------------------|-----------------------|
| 辅助参数 | | |
| 分界点 1 | -1.893 *** (0.294) | -1.162 *** (0.423) |
| 分界点 2 | -0.344 (0.295) | 0.394 (0.427) |
| 分界点 3 | 2.693 *** (0.330) | 3.442 *** (0.465) |
| 样本量 | 1035 | |
| 数据库数量 | 30 | |

注：(1) 括号中为标准误；(2) 显著性水平：*** $p < 0.001$, ** $p < 0.01$, * $p < 0.05$, † $p < 0.1$ （双尾检验）。

除了交往对象社会地位，家庭的客观经济地位对于主观地位认同也有着正向的影响，家庭人均年收入和人均房产价值两个指标均与地位认同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系数分别为 0.307 和 0.101）。这说明社会交往并不能完全消除或代替客观经济地位对主观地位认同的影响，客观地位仍是影响主观地位认同的重要因素。

此外，模型 1 结果还表明男性与女性相比更倾向于对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进行较低的评价；年龄也与地位认同有一定的负相关关系，但仅在 0.1 的边际水平上显著。从模型 2 中，我们可以进一步发现年龄对于地位认同的影响主要表现为“40 岁及以上”和“40 岁以下”两组之间的差异。“40-49 岁”组和“50 岁及以上”组的系数分别为 -0.723 和 -0.985，均在 0.05 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而“30-39 岁”组的系数仅为 -0.113，与“30 岁以下”组并无显著差异。

（二）社会交往与主观地位认同关系的性别、年龄差异

为验证假设 2，在模型 3 至模型 5 中，我们分别加入了性别、年龄和年龄分组与交往对象平均地位得分的交互项。数据分析结果如表 4 所示。

在模型 3 中，虽然性别和交往对象社会地位的交互项系数统计检验结果并不显著，但我们可以发现，与模型 1 相比，交往对象平均地位得分这一变量自身的系数从 0.252 下降到了 0.185，且不再显著。这说明对于女性（性别变量的参照组）而言，社会交往与其自身的地位认同之间并没有紧密的联系。但是，对于男性而言，交往对象社会地位的系数达到了 0.324（0.185 + 0.139，在 0.05 的显著性水平上显

著)。因此,可以说社会交往对象的社会地位特征仅对男性的主观地位认同有所影响,对于女性而言,其影响并不显著。据此,假设 2.1 得到了验证。

表 4 2009 年广州市居民主观地位认同影响因素的 Ologit 分析结果 (二)

| | 模型 3 | 模型 4 | 模型 5 |
|-------------------|--------------------------------|-----------------------|-----------------------|
| 交往对象平均地位得分 | 0.185 (0.129) | -0.072 (0.247) | 0.130 (0.161) |
| 家庭人均收入 (ln) | 0.307 *** (0.057) | 0.307 *** (0.058) | 0.297 *** (0.058) |
| 人均房产价值 (ln) | 0.101 *** (0.022) | 0.101 *** (0.022) | 0.102 *** (0.022) |
| 交往对象平均年龄 | 0.005 (0.018) | 0.005 (0.018) | 0.006 (0.014) |
| 男性 | -0.744 * (0.343) | -0.465 *** (0.130) | -0.469 *** (0.131) |
| 年龄 | -0.029 [†] (0.016) | -0.046 * (0.020) | |
| 年龄分组 (30 岁以下为参照组) | | | |
| 30-39 岁 | | | -0.244 (0.464) |
| 40-49 岁 | | | -1.104 * (0.535) |
| 50 岁及以上 | | | -1.412 * (0.576) |
| 交互项 (* 交往对象地位得分) | | | |
| 男性 | 0.139 (0.161) | | |
| 年龄 | | 0.008 (0.006) | |
| 年龄分组 (30 岁以下为参照组) | | | |
| 30-39 岁 | | | 0.072 (0.213) |
| 40-49 岁 | | | 0.193 (0.216) |
| 50 岁及以上 | | | 0.209 (0.198) |

续表

| | 模型 3 | 模型 4 | 模型 5 |
|-------|----------------------|--------------------------------|---------------------|
| 辅助参数 | | | |
| 分界点 1 | -2.029*** (0.327) | -2.544*** (0.526) | -1.377** (0.471) |
| 分界点 2 | -0.477 (0.326) | -0.992 [†] (0.526) | 0.183 (0.474) |
| 分界点 3 | 2.559*** (0.356) | 2.044*** (0.545) | 3.230*** (0.505) |
| 样本量 | 1035 | | |
| 数据库数量 | 30 | | |

注：(1) 括号中为标准误；(2) 显著性水平：*** $p < 0.001$, ** $p < 0.01$, * $p < 0.05$, [†] $p < 0.1$ (双尾检验)

与模型 3 类似，模型 4 和模型 5 中加入的交互项也不显著，但同样，交往对象平均地位得分本身的系数与模型 1 和模型 2 相比也均有较大幅度下降，且不再具有统计学上的显著意义。从模型 5 可以看出，与年龄对于地位认同的直接影响类似，年龄与交往对象社会地位得分的交互影响也主要表现为“40 岁以下”和“40 岁及以上”两组之间的差异。但是，与假设 2.2 中所预测的相反，随着年龄的增长，交往对象的社会地位对于被调查者地位认同的影响非但没有下降，反而有所上升。对于“30 岁以下”和“30-39 岁”两组被调查者而言，交往对象的社会地位对于主观地位认同的影响较小（系数分别仅为 0.130 和 0.202，均不显著）；但是对于“40-49 岁”和“50 岁及以上”两组而言，交往对象平均地位得分的系数分别达到了 0.323（在 0.1 的边际水平上显著）和 0.340（在 0.05 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虽然模型 4 和模型 5 中的数据分析结果与假设 2.2 相反，但这并不一定说明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会更关注自己的社会经济地位。相反，我们认为这一结果很有可能是由于社会交往所带来的社会资本在我国的重要作用所造成的。

在我国，基于社会交往的“关系”网络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起着重要的资源配置作用（Bian, 1997），而这种非正式的资源配置是以人们在“关系”网络中通过长期互惠所获得的“信誉”为基础的（边燕杰，2004）。随着年龄的增长，个体与其交往对象之间的长期互惠关系将越发稳定，因而在这种非正式的资源分配关系中的“信誉”也会越来越强。因此，对于拥有稳定的社会关系的年长者而言，其交往对象的社会地位越高，就意味着他通过自己的社会关系网络可以间接利用的资源也

相对较多，这就使得他更可能对自己的社会地位进行较高的评价。当然，由于缺乏对于社会交往关系稳定性以及基于社会交往的资源交换的测量，我们在本研究中无法对上述推论进行实证检验。

五、结 论

运用2009年JSNET调查广州数据进行分析，本研究发现随着社会交往对象地位的升高，人们对自己社会经济地位的评价会有所升高，而非下降。我们认为，这一研究结果反映了人们会在社会比较的过程中，根据社会交往对象的社会经济地位对自己的主观地位认同进行相应的调整。具体而言，社会交往对于主观地位认同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一种“群际比较”过程，即个体首先根据自己社会交往对象的社会经济地位来确定自己的群体归属，并进而根据这种群体归属来调整对自身社会经济地位的评价。

上述发现从微观层面对社会比较作用于地位认同的一般机制进行了探讨，但与现有的“同质参照群体理论”及其对于“中层认同现象”的解释存在着一定的矛盾。我们认为，这是由于研究的关注点不同所造成的。“同质参照群体理论”主要关注处于社会等级体系两级的人对自己地位评价的偏差，即为什么处于社会上层的人倾向于拥有自己处于“中层”或“中上层”的主观地位认同，而处于社会下层的人会拥有自己处于“中层”或“中下层”的地位认同；而本研究主要关注的是适用于大多数社会成员的社会交往影响主观地位认同的一般化作用机制。由于所用数据仅包括有过非农工作经历的样本，因此处于社会底层的无业者与农业劳动者被自然地排除出了分析范围。同时由于样本量有限，也无法对处于社会最上层的群体进行有效的估计。因此，对于这两种极端情况仍有待其他研究进行更为深入的探讨。

此外，通过分析社会交往对于地位认同的影响的性别差异，本研究发现社会交往对象的社会地位仅对男性的地位认同有显著的影响，对女性的影响并不显著。我们认为这是由于在传统的性别角色观念的影响下，男性对于自己和自己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的关注程度更高，因而也就更可能将自己的社会经济地位纳入社会比较的范围所造成的。在年龄差异方面，数据分析结果显示社会交往仅对于40岁及以上人群的地位认同有显著影响。我们认为，这很有可能是由于社会交往在我国起到的非

正式的资源配置作用所导致的。在我国，“关系”对于稀有资源的获取有着重要的影响，而这种基于“关系”的社会交换是以交换双方的长期互惠关系和“信誉”为基础的。因此，对于处于职业发展中后期的人而言，虽然他们对于自己社会地位的关注有所减弱，将自己的社会地位与其他个人或群体进行比较的动机也相对较低，但由于可以通过稳定的“关系”间接利用自己社会交往对象所掌握的稀有资源，因此交往对象的社会地位仍对他们的地位认同有着重要的影响。不过这种影响是独立于社会比较过程的，事实上它在本质上反映的是社会资本对于我国居民社会经济地位，而非主观地位认同的影响，因而本文并不对其进行更为深入的讨论。

参考文献：

- 边燕杰，2004，《城市居民社会资本的来源及作用：网络观点与调查发现》，《中国社会科学》第3期。
- 陈光金，2013，《不仅有“相对剥夺”，还有“生存焦虑”——中国主观认同阶层分布十年变迁的实证分析（2001-2011）》，《黑龙江社会科学》第5期。
- 高勇，2013，《地位层级认同为何下移兼论地位层级认同基础的转变》，《社会》第4期。
- 华红琴、翁定军，2013，《社会地位、生活境遇与焦虑》，《社会》第1期。
- 李路路，2012，《社会结构阶层化和利益关系市场化——中国社会管理面临的新挑战》，《社会学研究》第2期。
- 林宗弘、吴晓刚，2010，《中国的制度变迁、阶级结构转型和收入不平等：1978-2005》，《社会》第6期。
- 李培林、张翼，2008，《中国中产阶级的规模、认同和社会态度》，《社会》第2期。
- 刘爱玉、佟新，2014，《性别观念现状及其影响因素——基于第三期全国妇女地位调查》，《中国社会科学》第2期。
- 刘欣，2001，《转型期中国大陆城市居民的阶层意识》，《社会学研究》第3期。
- ，2002，《相对剥夺地位与阶层认知》，《社会学研究》第1期。
- 卢福营、张兆曙，2006，《客观地位分层与主观地位认同》，《中国人口科学》第3期。
- 吴琼、谢宇，2014，《经济地位与主观幸福感》，谢宇、张晓波、李建新、于学军、任强编《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4（征求意见稿）》，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西安交通大学实证社会科学研究所，2013，《社会网络与职业经历问卷调查（JSNET2009）》，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2002，《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Andersen, R. & J. Curtis 2012, “The Polarizing Effect Of Economic Inequality On Class Identification: Evidence from 44 countries.” *Research in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Mobility* 30 (1).
- Bian, Yanjie 1997, “Bring Strong Ties Back In: Indirect ties, network bridges, and job searches in China.”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2 (3).

Burawoy, M. 2014, "Facing An Unequal World: challenges for global sociology." presented at XVIII ISA World Congress of Sociology. Yokohama, Japan.

Cai, Yongshun 2008, "Local Governments and the Suppression of Popular Resistance in China." *The China Quarterly* 193.

Evans, M. D. R. & J. Kelley 2004, "Subjective Social Location: data from 21 nation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16 (1).

Festinger, L. 1954, "A Theory Of Social Comparison Processes." *Human Relations* 7 (2).

Goldthorpe, J. H. , D. Lockwood, F. Bechhofer & J. Platt 1969, *The Affluent Worker in the Class Structu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addon, E. 2014, "Class identification in New Zealand: An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lass position and subjective social location." *Journal of Sociology*, Online prepublished.

Hogg, M. A. 2000, "Subjective Uncertainty Reduction Through Self-Categorization: A motivational theory of social identity processes." *European Review of Social Psychology* 11 (1).

Li, P. 2014, "China's Inequality and the New Stage of Development." presented at Third Sino-French Conference LIA. Beijing.

Lindemann, K. & E. Saar 2014, "Contextual Effects On Subjective Social Position: Evidence from European countri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parative Sociology* 55 (1).

Pérez-Ahumada, P. 2014, "Class Consciousness In A Mature Neoliberal Society: Evidence from Chile." *Research in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Mobility* 38.

Woelfel, J. & A. O. Haller 1971, "Significant Others, The Self-Reflexive Act And The Attitude Formation Proces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36 (1).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责任编辑：陈建伟

Social Comparison and Subjective Status-Identification: Evidence from Guangzhou

..... *Liu Han* 51

Abstract: Based on the theory of social comparison, this study proposes a generalized mechanism about subjective status-identification formation in the process of social comparison using JSNET 2009 Guangzhou Data. According to the data, interacting with people of higher social echelon may, *ceteris paribus*, increase an individual's subjective status-identification. During the process of social comparison, the principal manifestations of subjective status-identification are consistent with the prediction of the intergroup comparison theory, rather than the inter-personal social comparison theory. Besides, there are also differentiations among social groups in term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comparison and subjective status-identification. The more attention people pay to their social status, the more likely that their subjective status-identification is correlated with social comparison.

Human Capital or Job Mobility? —An Empirical Study on Migrant Workers' Wage Growth Mechanism *Wei Ji* 68

Abstract: Based upon the human capital and job search theory under the institutional background during the economic transitional period, this research used the 2002 Chinese Household Income Survey (CHIPs) data and adopted the Heckman treatment effect model to analyze the effect of human capital and job mobility on migrant workers' income and to investigate the micro-mechanism of their wage growth. The role of education in the variations of wage growth mechanism was also studied. The findings show that two distinct wage growth mechanisms (i.e., human capital mechanism and job mobility mechanism) co-exist in the labor market during the economic transitional period, and both can be used to explain wage growth for migrant workers. The results also indicate that the above mechanisms have different influences on two types of migrant workers. For highly-educated workers, investment in and accumulation of human capital are the main mode of increase in income, and job mobility causes the interruption of accumulation of human capital. In contrast, low-educated workers find employment with better pay and commensurate rewards in the labor market through job mobility; however, human capital does not contribute significantly to pay rise.

China's Growth and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 (SMEs) Utilization of Social Resources: A Case Study of Company H in Pu town *Li Yingfei* 85

Abstract: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relation between China's growth and the SMEs' utilization of social